

治水“劳”而无功？只因康熙冤枉一人

康熙三十六年(1696年)春,皇帝率大军离京,准备给准噶尔军队最后一击。三月二十五日,大军抵达宁夏境内的横城堡。横城堡是明朝兴建的军事要塞,西临黄河,离渡口三里地。康熙帝遥望滔滔河水,百感交集,作诗一首:“历尽边山再渡河,沙平岸阔水无波。汤汤南去劳疏筑,惟此分渠利赖多。”他一生危机四伏,屡逢劲敌皆有惊无险。唯独这黄河,自康熙十六年(1676年)决定治水以来,用去二十年却始终没解决。诗中的“汤汤南去劳疏筑”一句,用个“劳”字,正显出康熙帝对本朝治水工程的反思与自嘲。



治河方略一書 先文襄公手定而成當
襄公任河道總督時風食水宿歷二十餘載其
間工程之險易物料之繁簡以及二守四防歲
修搶築靡不勞神運思鉅細畢舉全河大勢瞭
然于心後之治河者咸手一編爲金鑑因鐫版
年久字跡漫漶方今購是書者且踵相接也鈞
復詳加校閱付之梓人俾 先人之清芬詒之
永久於國計民生有裨益焉
治河方略 卷一

靳辅《治河方略》

择用靳辅，支持他放手一搏

据《清圣祖实录》载:“朕听政以来,以三藩及河务、漕运为三大事。夙夜靡念,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。”康熙帝所忧虑的三件事,从短期来看,其实是同一件事。河务,目的是解决水患,便利漕运。漕运,目的是充实国库,储备好军资粮饷,俾得以剿灭三藩。但是从长远来看,三藩尚可尽灭,河务和漕运却年年不免,所以以后两者才是真正真正的大问题。

漕运要走水路,京杭大运河是重中之重。因此吴三桂举兵以后,康熙帝急命堂兄康亲王率军南下,救援浙江。至康熙十六年(1676年)三月,清军重新控制福建、江西等省,使浙江变作后方,不复有兵灾之虑。康熙帝把握时机,立刻启动了治水工程。

康熙帝相中了时任安徽巡抚的靳辅。靳辅,字紫垣,隶属八旗汉军中的镶黄旗,康熙九年(1670年)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,次年出任安徽巡抚。他是崇祯六年(1633年)生人,任巡抚时,年龄尚不满四十,却被交予一省之行政事务,其才干可以想见。

靳辅治理安徽的那几年里,特别留意水利问题,尤其是黄河的泛滥问题。原来“靖康之变”以后,宋军受所谓“长江天堑”的启发,曾故意破坏河南的黄河堤防,欲制造一条新的“天堑”以拦阻金兵。黄河本来是从河南向北,流进渤海,至此竟折而往南,取道皖北、江苏,流到了黄海去了。而黄河南下,自然和淮河相撞,二水叠加,河道里水量暴涨,沿岸溢出,就酿成洪灾。安徽省本就被长江和淮河水灾所苦,这时添了黄河,老百姓可真是倒足大霉。不敢种地,就只好外出经商。所以徽州商帮,赫赫有名,其实是当地的环境使然。

京杭大运河和淮河相交。黄河南下,非但影响淮河,更影响了大运河的漕运。康熙帝知道靳辅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,便将他调任河道总督,主抓黄河、淮河等河道政务。靳辅一上任就递交了八道奏疏,分作八个问题,阐释该怎样治河。概要说来,就是把黄河分流,削弱其对淮河的影响,同时给京杭大运河新挖一段河道,使运河独立出去,不再受黄、淮影响,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。康熙帝认可他的想法,拨款拨粮,全力支持他放手一搏。

束水攻沙，淹没了明朝祖坟

靳辅以前,明朝中后期有一位潘季驯,曾四次治河,并自创了一套“束水攻沙”之法,取得了一定成

效。所谓“束水攻沙”法,其原理说来简单,乃是加固河道,筑坝筑堤,提高水位,使河道里水量加大,水流剧烈,就会把河底沉积的泥沙带走,泥沙不再淤积,水位就不会升高,河水不漫出堤坝,自然就不会再形成水灾。可是说来简单,现实却极费人工。光是潘季驯的最后一次治河,筑堤工程就接近三十万丈,所花费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皆难以计量。

潘季驯穷尽十几年的光阴,总算把淮河末段的一系列出水口全部闭塞,又兴建了高家堰水坝,使洪泽湖变成储蓄淮水的大水库。倘若黄河下游的泥沙淤积,有泛滥之险,危及漕运,便大举放出淮水,冲动泥沙,将泥沙带进黄海。以最轻便的开闸之力,收疏浚之效,可说是“四两拨千斤”的高明策略。

靳辅非常佩服潘季驯的“束水攻沙”法,此番治水,正是师其故智。可是黄河的水势往往比淮河要大,淮水若不敌黄水,就会被倒撞回来,使水库附近的地区,沦作泽国。所以潘季驯治水的后期,要不断加高加固高家堰,以求其所蓄的水势足可战胜黄河。靳辅既然是依着他的思路治水,自不免重复这一项操作,不料竟造成意外的恶果。

需知明清时期定都北京,经济上倚靠东南。这就把中部一带变作次要地区。朝廷不肯放黄河北上,又不敢让水势冲击到东南漕运,只好牺牲中部地区,尽量散去黄河水。这是东、南、北三方利益权衡的结果。因之,明清以后的治河方略,都默认放弃了皖北附近的淮安、泗州等地。特别是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城,城郊有朱元璋的祖坟,称作祖陵。潘季驯治河时,淮水曾漫至祖陵的石阶,可是他放任不管,硬撑到水势消退。到了清朝,自然更没人顾念明祖陵了,毋宁说前朝祖坟,没了更好。所以靳辅巩固高家堰以后,康熙十九年(1680年)的一次黄河水灾之中,淮水倒流,洪泽湖面积拓宽,明祖陵居然永沉湖底,直到1963年水位下降,遗址才露出来重见天日。

庙堂争论，康熙帝执意干扰

靳辅舍弃部分地区后,另一部分地区的水患得到整治,至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取得阶段性的成果。康熙帝满怀希望,次年九月特地到南方巡视,一看之下竟大失所望。原来靳辅治水,首要目标是保证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安全,却是上一阶段的“旧目标”,不符合最新需求。盖因历史发展到康熙二十三年,不但三藩皆平,连台湾都被福建水师收复。海内升平,康熙帝最着急的不再是国库虚实,而是老百姓踏实生活,千万别揭竿造反。所以这一阶段的治水目标,其实是安民维稳。

康熙帝巡河之后,觉得靳辅虽然解决了黄河下游的淤积问题,对老百姓却非常不利。将淮水集中到水库里面,不但使两岸的灌溉受损,水库附近州县的农田更经常被淹。康熙帝深知朝廷不该和黎民争利,有意斥巨资疏浚海口,使黄河可以顺利下行,避免再利用淮水,干扰农业。正好这时收到安徽按察使于成龙的奏议,他便打算让于成龙主持其事。

康熙一朝,有两个于成龙。年长的那位,是山

西永宁人,康熙帝那句“天下廉吏第一”就是称赞他的。年轻的那位,和靳辅一样是八旗汉军的镶黄旗人。两人都以清廉著称,惺惺相惜,老于成龙曾举荐小于成龙担任江宁(南京)知府。康熙帝南巡抵达江宁之时,特地将小于成龙嘉勉一番,擢升他做了安徽按察使。

于成龙当了安徽百姓的父母官,目睹靳辅治水破坏当地农业,自是义愤填膺,立刻上奏朝廷,一则直斥靳辅之恶,一则提议疏浚海口。康熙帝正有此意,便询问靳辅可否更换治河方略,以求两全其美。靳辅的答复则是:依据丈量结果,黄河海口比内陆要高出五尺,倘若疏浚海口,则海水倒灌进河,会引发新的灾难。

可是靳辅虽然据理力争,群臣却看出他有“抗旨”倾向,纷纷落井下石。靳辅因此渐渐失去康熙帝的支持和信任,拖到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的三月,终归是被革职了。

自叹自嘲，不知道何日功成

靳辅被革职以后,康熙帝的治水大计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?答案是否。靳辅刚刚倒台,康熙帝就接到两个报告。坏的报告,是说漕运阻滞,提议派靳辅解决。好的报告,则是说靳辅主持挖掘的备用运河开通了。两个报告,其实都是肯定靳辅的治河有功。康熙帝思忖再三,唯恐其成果被毁,急忙指示新上任的河道总督,所有建好的水闸、堤坝、引河,皆依照靳辅昔日所定的章程行事,不需要擅自变动。

接替靳辅担任河道总督的人,是八旗汉军镶蓝旗的王新命。此人当了四年的河道总督,直至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二月,被揭发贪污公款数万两,革职查办。康熙帝因此更思念靳辅,敦请他再次出山。可是靳辅年近六旬,体衰屡病,劳碌之下,当年十一月就累死了。

靳辅死后,康熙帝思来想去,只有于成龙可靠,因此宣布由于成龙继任河道总督。以前,于成龙曾弹劾靳辅无缘无故开凿河道,疲敝百姓。但是他欠缺治水的经验,无法推翻靳辅之论。后来他遍阅诸书,推究古人的治水方略,才懂得谁是谁非。他上任后,完全按靳辅的方案执行,面对康熙帝的疑问,坦然答道:“臣彼时妄言,今亦视辅而行。”

于成龙担任河道总督,鞠躬尽瘁,八年后因劳累过度,死在任上(其间,于成龙回家奔丧,由董安国做了三年,后再由于成龙继任)。两江总督张鹏翮调任河道总督,继续治理三年,至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取得显著成效。同年,康熙帝第四次南巡,乘船观堤,欣然说道:“朕此番南巡,遍阅河工,大约已成功矣!”

统计康熙帝治理黄河,共用去二十六年。本文开篇,康熙帝亲征准噶尔之际,河道总督是董安国。董安国不得其法,次年便因无能而被罢职。康熙帝看着滔滔河水,回想二十年来的治水历史,倘若不是他横加干预,靳辅一定卓然有成,又何苦将此麻烦之事,留给后面的那些“半吊子”呢?

诗中的“疏筑”二字,分指疏浚河道、筑堤筑坝,两件事都是经年累月,花费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,而迟迟不见奏功。如此疏筑,究竟是不是“劳”而无功?康熙帝当时是没把握的,他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,甚至此生能不能目睹河务竣工。他唯一确信的是,他将会督率群臣,毅然决然,把靳辅的方案验证到底。

文图来源:北京晚报